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摘录）

[英] 乔治·奥威尔¹

第1章

……这件事情发生在1936年12月底，距我写下这些文字还不到七个月，但这段时期已经渐行渐远，遥不可及了。……我来到西班牙，初衷是写一些新闻报道，但我几乎立刻就加入了民兵组织，因为在那个时期和那种氛围下，这似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安那祺主义者仍然实际上控制着加泰罗尼亚，革命仍然处于高潮之中。对于任何一个从革命爆发就在那里的人来说，甚至在当年十二月或次年一月，革命时期似乎就要结束了。但是对一个直接从英格兰前来的人而言，巴塞罗那看起来既令人吃惊，又无法抗拒。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一个工人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城市。特别是，无论何种规模的建筑都控制在工人阶级手中，屋顶上都插着红旗或安那祺主义者的红黑两色旗；每一面墙上都随意地涂画上锤子和镰刀的标记，以及革命党名称的首字母缩写；几乎每个教堂都被清洗过，所有神像都被焚毁。各处教堂都被工人逐一地破坏了。每间店铺和咖啡店的门口都写有文字，说明其已被收归集体所有；就连擦皮鞋的儿童加入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红色和黑色。服务员和巡视员直视你的脸，把自己当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礼仪性的套话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Senor’（大、老）或者‘Don’（先生、老爷）甚至是‘Usted’（您），每个人都称别人为“同志”、“你”，说Salud!，而非‘Buenos días’。我的第一个经历是试图给一位电梯管理员小费，就受到了酒店经理的告诫。没有私人汽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有轨电车、出租车，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红色和黑色。革命的海报用醒目的红色和蓝色印刷，四处张贴，贴在墙上相当显眼。相形之下，残留在墙上的为数不多的昔日广告招贴画，像是一些胡乱涂抹上去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在拉姆拉斯南面，宽阔的主大街上聚集了庞大的人群，不时地来回走动。大喇叭整天播放着刺耳的革命歌曲，直至深夜。这些人乍看起来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生灵了。从表面上看，这座城市的富有阶级已经消失了。除了很少一部分女性和外国人，这里根本没有穿着考究的人。事实上，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或蓝外套，或不同样式的民兵制服。所有这些都十分奇特，令人震撼。这里有很多我不理解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根本不喜欢，但我立即就认为这种情景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我也相信，事情就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里确实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所有的资产阶级不是逃走了、被杀掉了，就是自愿地转向工人阶级阵营；我并没有意识到，还有大量富裕的资产阶级潜伏着，暂时把自己装扮成无产者的模样。

与此同时，这里也存在着某种战争的罪恶气氛。这个城市看起来既灰暗不堪又极不整洁，公路和建筑物几乎无人维护。为防空袭，夜晚的街道昏暗无光；大部分商店非常破旧，几乎空空如也。肉类奇缺，牛奶简直难觅踪迹，煤炭、食糖和汽油都十分匮乏，更为严重的是面包供不应求，购买面包者排成的队伍常常达数百码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判断出，这里的人民是满足的和充满希望的。这里没人失业，维持生存所需的费用仍然极其低廉；你很难看到极端贫困的人，除了流浪汉之外，也很难看到乞丐。最重要的是，人们有着对革命和未来的信念，产生出了一种突然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们尝试着表现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个小小的齿轮。理发店里贴着的安那祺主义者的通告（大部分理发师都是安那祺主义者）庄严宣布，理发师不再低人一等了。大街上张贴着彩色的海报，呼吁废除娼妓制度，让妓女从良。……

¹（校注）原译者：李华，刘锦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引自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homeagetocatalonia.htm>。原译作为报告文学文笔流畅，因为中文读者不熟悉这段历史，值得推荐。摘录主要为关于安那祺主义的部分。校注根据Orwell in Spain. Ed. Peter Davison, Penguin Books, 2001 在政治用语、意义和一些重要的表述上改动较多。

指挥我们的陆军上尉是一个结实的、没有经验的、令人愉快的年轻人，以前是正规军队的军官，就他整洁的仪容和崭新的制服来看，现在也依然像个正规军队的军官。最奇特的是，他还是一个很忠诚和热情洋溢的社会主义者。他坚持在所有的队列中实行完全的社会平等，这比那些队伍中的民兵自己所要求的还要彻底。我还记得，当一个幼稚的新兵叫他“先生”时他的那副带着痛苦的惊讶神情。“什么！先生？是谁叫我先生？难道我们不是同志吗？”我很怀疑这样做是否能让他的工作变得轻松一点。……

第3章

……在那时以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加泰罗尼亚的民兵始终坚持自己在战争开始时的阵地位置。在佛朗哥政变的早期，各种工会和政党大都匆匆忙忙地组建了自己的民兵队伍；每一个民兵组织实质上就是某个政治组织，它们效忠于自己的政党，有如效忠中央政府。名义上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的大众军在1937年初按照常规方式组建，党的民兵从理论上来说已合并到大众军中去了，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一切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新建起来的大众军的大部分人马迟至六月才开赴阿拉贡前线。在此之前，整个民兵制度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官兵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社会平等。民兵组织中的每一个人，从将军到士兵，大家拿同等的薪金，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一切都完全平等。如果有个士兵拍拍将军的背，向他要一支香烟，没有人见怪。理论上，民兵是民主的而非等级组织。命令应当被执行，这也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但当你发出命令时，你所发出的命令是同志式的，而不是上级对下级的方式。这里虽然也有军官和军士，但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军阶、军衔、徽章，以及咔嚓一声立正敬礼之类的东西。他们试图在民兵中组织创造一种暂时的无阶级社会的模式。当然，这种平等还不是人们理想中的平等，但这比我在战时曾经看到过或想到过的一切都更接近于理想。

……指责民兵成为一种风气，甚至连训练不足和武器奇缺的责任也被无端地归咎于民兵中的平均主义制度。事实上，任何一支刚组建起来的民兵队伍都不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原因并非在于军官们被称为“同志”，而是因为任何一支军队在草创时期全都必然如此。事实上，民主的“革命”式的军事纪律比最初预期的要好得多。在一支工人民兵队伍中，军事纪律在理论上也是同样应该被自愿执行的。这种纪律建立在忠诚于本阶级的基础上。相反，一支从资产阶级中征募的队伍，其纪律则最终是建立在强制和恐惧的基础上（取代民兵的大众军则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其他军队中盛行的欺凌和辱骂行为，在民兵队伍中是任何时候也不能被容忍的。在民兵队伍中正常的纪律处罚依然保留着，但处罚只被适用于最严重的过失。当某个人拒绝服从命令时，不会立即让他受到惩处，人们首先要以同志式的友好态度对他进行劝导。没有经验的嘲笑者会立刻指出，这样做决不会起作用。但事实表明这样做从长期看的确是“起作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是民兵中最不守纪律的一些人也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一月份，为了让十二个新兵达到要求，把我的头发都快折腾白了。在五月，我一度担任代理中尉的职务，指挥三十个人，其中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几个月来，我们持续遭受进攻，在下达命令或要求自愿从事某项危险工作方面，我几乎从未遇到过什么困难。“革命”纪律要靠政治觉悟来执行——要理解服从命令的原因，要把这种观念推广开来需要时间，但是要把一个人训练成兵营里的机器人也同样需要时间。嘲笑民兵队伍的新闻记者也许很少记得，当大众军尚在后方训练时，是民兵们在前线坚守着。从根本上来讲，民兵能守在阵地上，这本身就是对“革命”纪律的力量的一种颂扬。直到1937年6月，民兵们能够留在那里，靠的完全就是对本阶级的无限忠诚。逃兵有可能被枪毙——在偶尔和特殊的情况下也确有逃兵被枪毙的——但如果上千人决定脱离战线，没有人能阻止他们。要是强征入伍的军队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宪兵队，早就逃散了。而民兵们却仍在固守前线阵地，临阵脱逃者更是极为罕见，尽管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赢得胜利的可能性是多么微乎其微。在置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民兵中的四、五个月里，我只听说有四个人开了小差，而且其中有两个人无疑是间谍，他们来到民兵队伍中完全是为了

获取情报。……

第 5 章

……这一地区的西班牙人很可能确实没有宗教信仰那种正统的精神寄托。我在西班牙没有看到任何人划过十字，这令人感到好生奇怪。你也许会认为这个动作出自本能，不管革命还是不革命。很明显，西班牙的教会还会卷土重来（就像有句谚语说的，夜晚和耶稣会士总是会回来的），但毫无疑问，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教会已经崩溃和瓦解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连处于类似境地的垂死的英国教会也不相信。对西班牙人民来说，至少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教堂正不折不扣地面临着严峻考验。基督教的信仰很可能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安那祺主义取代了，安那祺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其影响深入人心，毋庸置疑，安那祺主义本身也带有某种宗教意味。……

第 7 章

……工人民兵，只有通过工会而且是由政治观点相近的人组成的工会的推举，才有权进入这个国家中最具革命情绪的地方。我或多或少偶然地来到这个所有西欧社会中唯一的一个在政治意识和敌视资本主义更普及的地方。在阿拉贡这个地方，每个人置身于数万人主要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群中，大家都生活在同等水平并信奉平等的原则。大家在理论上完全平等，在实际上也差不多平等。这里人们预先品尝到了社会主义的滋味，我想说的是，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氛围就是社会主义的。许多文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行为——势利、压榨钱财、惧怕老板等等都已不复存在。森严的社会阶级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失，这在充满铜臭空气的英国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儿只有农民和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人想要别人来做他的主宰。当然，这样的事态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它只是世界大拼杀的一个暂时的局部过程。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毕竟对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那时的咒骂声有多少，但事后人们却总是发现自己确实与某种奇怪的、有价值的东西有所联系。人们相处在集体中，满怀希望要比冷漠或玩世不恭更正常，“同志”一词代表着友谊，不像在许多国家里那样代表着欺骗。人人都呼吸到了平等的空气。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时下正在流行的否定社会主义与平等有任何关系的滥调。在世界各国，都有许多政治党派重金雇佣一大批帮闲文人和圆滑世故的教授，忙于“证明”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抓住尚未为人把握的机遇而设计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幸运的是，也有与此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存在。真正吸引着普通人投身社会主义。使他们愿意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神秘感”而甘冒生命危险的，正是平等这个理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社会主义意味着它是一个无阶级制度的社会，否则什么也不是。正是因为如此，我在这儿——在民兵部队的那几个月，对我很重要。只要他们存在下去，西班牙民兵部队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那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虽然每样东西都短缺，但没有特权和巴结，人人都能粗略地尝到可能像社会主义起始阶段那样的滋味。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建立。这部分也是由于我有幸置身于西班牙人中。凭着西班牙人与生俱来的高雅和无时不在的安那祺主义色彩，如果把握好机会，他们一定能在初始阶段就创造出宽容的社会主义。……

第 8 章

……战争期间，每一个在相隔几个月来到巴塞罗那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惊诧的是，不管他们是先在八月、后在一月来的，还是和我一样先在十二月、后在四月到的，大家

反复议论的就是一件事：那里的革命气氛已经消失。无疑，对于在八月当街道上的血还未干掉、民兵进驻小旅馆时去过那里的人来说，到了十二月，巴塞罗那已经变得好像是资产阶级的了。但是，对于我这样刚从英国来的人来说，它却比我事先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现在，高潮已经退去。巴塞罗那再次成为普通的城市，一座因战争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败的城市，不再有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明显迹象。

这里人们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已经不见了，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西班牙裁缝精心缝制的时髦夏装。大腹便便的男人、时髦的女人、豪华轿车，比比皆是。（看起来，还没有私家车，不过，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好象都可以支配得起。）在我离开巴塞罗那尚不存在的新的大众军军官们成群结队地走动，数量多得惊人。大众军以一比十的官兵比例配备军官。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曾在民兵中服过役，基本上都是以军事骨干名义从前线抽调来的，但是，大多数则是进过军校、而不愿参加民兵的年轻人。大众军的官兵关系确实与资产阶级军队的不同，但仍有明显的社会差别，表现在薪金和制服的不同。士兵穿的是一种粗糙的褐色紧身军服；军官则穿着全套精致、收腰的卡几布制服，像英国军队中的军官制服，当然仅仅是有那么点像而已。我懒得去猜想他们二十人中有没有一个以上的人真正地参加过战斗，可他们的皮带上全都挂着自动手枪；我们在前线时，如果不是特别嗜好或花上一笔钱，就不能得到手枪。我发现，我们在街道上行走时，人们总是在注视着我们的脏兮兮的样子。当然，如同所有在前线待了好几个月的士兵一样，我们的模样确实十分可怕。我意识到自己看起来像个稻草人。我的皮夹克破破烂烂，织针的军帽早就变了形，而且常常滑下来遮住眼睛，我的长靴除了开裂的鞋帮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是这副惨象，再加上浑身污垢、满面胡须，也就难怪人们总是投来惊诧的目光了。但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还是最近三个月里发生的怪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通过大量的迹象，我发现我最初的印象没有错。这座城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两个突出的变化决定了其他事情。一是人们——全体居民——对战争的兴趣已经丧失大半；二是社会重新回归贫穷和富有、上层和下层的分化。

人们对战争的普遍莫不关心，已经到了触目惊心 and 令人厌恶的程度。这使得从马德里甚至巴伦西亚来到巴塞罗那的人也感到震惊。部分原因也可能在于巴塞罗那远离真正的战斗。一个月以后，在塔拉戈纳，我目睹了同样的情形，在这个漂亮的海滨小镇上，人们的一切依然如故，似乎从没受过任何干扰。原先遍及西班牙的民兵志愿者，从一月起逐步减少。二月，中央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掀起了一场参加大众军的大规模动员运动，但并没有征集更多士兵。战争仅进行大约六个月，政府就不得不采用征兵手段，如果这是对外战争，采用这种办法也许尚在情理之中，但在国内战争中这么做就似乎太不正常了。这无疑与人们对战争偏离最初的革命目标深感失望密切相关。那些自发组成民兵队伍的工会成员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把法西斯赶回萨拉戈萨，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工人阶级控制而战。但是，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人阶级失去了控制。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往往是被迫卷入各种内外战争的，不应因对战争存有某种冷漠而受到责难。没有人想输掉战争，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战争早点结束。这一点你无论在哪里都能觉察到。人们到处都能听到同样看似轻描淡写的评论：“这场战争——可怕，不是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有政治头脑的人更关注安那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与佛朗哥的战斗。对好多人来说，食物短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结果，“前线”被认为是一个神话般遥远、年轻人消失的地方，他们要么永远回不来了，要么就会在三四个月后兜里装着大笔钱回家休假。（民兵休假期间的薪金，通常能够提前支付。）至于伤员，即使他们仍然甩不掉拐杖，也得不到任何特殊的照顾。参加民兵已经不再时髦。商店——通常总是最能体现大众倾向的地方——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我初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多数商店尽管简陋破旧，但几乎家家商店都经营民兵装备。军帽、拉链夹克衫、军用皮带、猎刀、水瓶、左轮手枪皮套等在每家商店的橱窗里都有陈列。现在，商店明显地精明起来，而战争却被抛在脑后。稍后我发现，我回前线所需要的装备，特别是人们在前线急需的那些东西，已经很难买到了。

与此同时，共和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反对政党民兵、支持大众军的系统宣传，令人难以理解。自二月起，从理论上讲，所有武装力量都已并入大众军，民兵名义上按照大众军的政策改编，有不同的薪水和军衔级别等。原则上，各个师应由混合旅即部分大众军和部分民兵共同组成，但实际上，唯一的变化就是把名称改换了一下。例如，把先前叫做“列宁师”的 POUM 控制的民兵，改称“第 29 师”。由于直到六月也很少有大众军开赴阿拉贡前线，因此民兵能够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但政府的宣传人员却仍坚持不懈地在每堵墙上用模版涂上“我们需要大众军”的字样，并通过政府控制的电台和共产党报纸对民兵进行攻击，恶意地嘲笑他们是一批缺乏训练、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等等。大众军自然总是被描绘成“英雄的军队”。听了这样的宣传，马上就会令你产生志愿奔赴战场不体面、坐等征兵才光荣的感觉。然而，他们对民兵在前线坚守着阵地、大众军却在后方休整训练的这一明显事实却罕有宣传。如今，重返前线的民兵队伍通过街道时，已经不再能够听到喧天锣鼓、看到彩旗飘飘的那种景象了。他们多在凌晨五点街道尚且冷冷清清的时候，被悄悄地送上火车或卡车。而人数不多的应征大众军战士开赴前线，则如同昔日一样，极其隆重张扬地穿越大街小巷，但即便是这些人，由于人们对战争的兴趣普遍减少，也很难受到多少热情欢呼。民兵部队在名义上也是大众军的事实被报纸巧妙地利用宣传，任何荣誉都必须让给大众军，而所有责任都应由民兵来负。有时候，同一个部队里作为大众军屡受表彰，又作为民兵倍受责难。

除了这些事以外，社会风气也有了惊人的变化——若非亲身经历你就很难相信。……

在城市的奢华和不断出现的贫困、街道上的虚假繁荣，包括花店、彩旗、宣传海报和拥挤的人群等等的表象下面，存在着一种明显和可怕的政治敌对和憎恨。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不无胆颤心惊地预感：“快有麻烦了。”眼前的危险，既简单又不难理解，其实就是那些希望革命深入和希望革命停止或避免的人们，最终是安那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政治上，除了 PSUC 和他们的自由派同盟外，现在，加泰罗尼亚没有其他力量了。但是，CNT 有难以轻视的力量，他们虽然缺乏精良的装备，对自己想要什么还不如对手明确，但他们人数众多，在许多重要行业占有优势。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注定会出麻烦。在 PSUC 控制的自治政府看来，要保证自己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必须从 CNT 工人的手中夺取武器。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逐步瓦解政党民兵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安排。同时，战前的武装警察、地方卫队²等等，已经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装备。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特别是，地方卫队属于那种欧洲大陆型的宪兵，他们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忠实地充当了有产阶级的保镖。自治政府同时发布一条命令，凡私人武器一定要上缴。这项命令自然没有得到遵从，很清楚，只能通过武力才能从安那祺主义者手里夺取武器。这样一来，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对遍及加泰罗尼亚的各种冲突，总是流传着含糊不清、相互矛盾的谣言。在许多地方，武装警察对安那祺主义者控制的重要地点发动攻击。在靠近法国边界上的普奇达，一帮马枪骑兵被派去占领了先前由安那祺主义者控制的海关，著名的安那祺主义者安东尼奥·马丁被杀害。我想，类似的事件在费卡洛死和塔拉戈纳也都发生过。在巴塞罗那，工人阶级控制的郊区，也曾有过一系列不那么过分激烈的争吵。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CNT 和 UGT 的成员接二连三地互相遭到谋杀，随谋杀而来的是盛大的、蓄意煽动政治仇恨的葬礼。……

“五·一”节就要到了，CNT 和 UGT 都在筹划参加大游行的事。CNT 的领导人比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要更为温和，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同 UGT 实现和解。的确，他们的政策主张是试图把两大联盟合并为一个更大的联盟。CNT 的想法是应该和 UGT 一起游行并显示他们的团结。但到最后一刻，游行被取消了。非常清楚，游行只会引起暴乱。因此，5 月 1 日这一天平静无事。这的确是一件怪事。巴塞罗那，这个号称革命的城市，也许是唯一一个在那一天没有举行庆祝活动的非法西斯的欧洲城市。但是，我承认，当时我长舒了一口气。那时，我们都希望（英国）独立工党小分队加入 POUM 的游行队伍，但也担心出乱子。我唯一担心的是大家有可能介入毫无意义的巷战。行进在红旗飘扬、口号高昂的街道上，

²（校注）Civil guards.

不小心被从街道旁窗口伸出来的陌生人的冲锋枪打死——我可不希望这样死去。

第9章

大约在5月3日中午，一位朋友在经过旅馆时嘴里冒出了一句话：“我听说电话局出事了。”由于某种原因，我当时并没怎么在意这句话。

……星期二的《团结报》——安那祺主义者的报纸，把电话局遭到攻击称之为“巨大的挑衅”（或类似字眼），但到了星期三，报纸就变了调子，开始恳求人们回去上班。安那祺主义者的领导人也发出了同样的信息。POUM的报纸《战斗》的办公室，大约在电话局遭到袭击的同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突击队的袭击和占领。但报纸仍在别的地址印刷并被分发出去，催促大家尽可能待在街垒里。人们惴惴不安、忧心忡忡，谁都知道事件究竟将如何了结。我怀疑到人们是否都离开了街垒，但人们都厌恶这种毫无意义的战斗，它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因为没有人想把它发展为一场新的大规模内部战斗，那只能意味着输掉反对弗朗哥的战争。这种担心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现。广大CNT成员的最初和一贯的要求只有两个：交还电话局和解除可恨的突击队的武装。如果自治政府答应做这两件事，并答应终止牟取食品暴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街垒会在两小时后全部拆除。但自治政府显然没有打算作出让步。居心叵测的谣言漫天飞。有传言称，巴伦西亚政府已派出6千名士兵前往占领巴塞罗那，而5千名安那祺主义者和POUM民兵则离开阿拉贡前线，准备抗击政府军。只有前者是真实的。……

从巴伦西亚开来的军队最初出现在街道上的时候，天色肯定已经很晚。他们都是突击队——一种类似地方突击队、可恶的地方卫队和马枪骑兵（主要从事警察工作的队伍）之类的编队，是共和国的精锐部队。他们好象是突然间从地下冒出来似的，你能够到处看到他们在街道上巡逻，每十个人一小组，他们身材高大，身着灰色或蓝色的制服，肩上背着长长的步枪，每个小组都配有一挺冲锋枪。……

第二天，巴伦西亚突击队的士兵到处出现，他们有如征服者般地迈步大街小巷。这无疑是在炫耀武力，目的在于吓唬政府自己也明知不会反抗的居民。假如担心发生新的暴动，他们就会待在街垒里，而不会一伙一伙地分散在大街上。他们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好和最华丽的军队，虽然我在某种意义上假定他们是“敌人”，我仍禁不住喜欢上他们的外表。但我用一种惊奇的目光在看着他们来回溜达。在阿拉贡前线，我见惯了衣衫褴褛、几乎没有装备的民兵，却不知道共和国还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他们不仅在身材上经过严格挑选，更使我吃惊的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全都装备了崭新的“俄式来复枪”（这些枪是苏联运给西班牙的，但我却相信那是美国制造的）。我察看过其中一支来复枪。它虽不是那么完美，但比起我们在前线用的那种糟糕透顶的老式大口径来复枪，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他们每十个士兵拥有一挺冲锋枪，每人拥有一支自动手枪，在前线，我们50人才可能有一挺机关枪，而手枪只能非法购买。事实上，我现在才注意到，到处都一样：不上前线的突击队和马枪骑兵们的装备比我们好，穿戴更棒。我猜想，大概在所有战争中都是一样的——后方着装时髦的警察和前线衣衫褴褛的士兵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差别。一两天后，巴伦西亚突击队和居民相安无事。第一天，一部分突袭队员以挑衅性的方式制造了许多麻烦，我想那是奉命行事。他们强行登上电车，搜查乘客，若乘客带有CNT会员证，就会立即撕毁，并扔在脚下践踏。这导致了他们与武装的安那祺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并有一两人身亡。不过，突击队很快就改变了征服者的架势，与居民的紧张关系也变得较为缓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仅在几天后就交上了一个女孩子。

巴塞罗那的战斗，给巴伦西亚政府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全面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借口。工人民兵将被解散，重新编入大众军。……

[附录 1]³

.....在我刚到西班牙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于政治形势既无兴趣，也不甚了解。我只知道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但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战争。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我的回答是：“反抗法西斯主义”；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而战，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尊严”。我赞同《新闻报》-《新政治家》的说法：这场战争是为了捍卫文明，反对希特勒支持的布林普斯上校部队的疯狂进攻。巴塞罗那的革命气氛深深地吸引着我，但我并不想去理解它。PSUC(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POUM，FAI，CNT，UGT，JCI，JSU，AIT 等诸如此类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各种政党和工会的名称，只是让我感到厌烦和愤怒。它们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西班牙的首字母略缩语似乎泛滥成灾。我只知道我参加的是一个名叫 POUM 的组织（其实我只是加入了属于 POUM 的民兵部队，并未参与他们的其他事情，因为在到达巴塞罗那时碰巧我只带着英国独立工党的一纸介绍信），但我并没有弄清它与其他政治党派之间有着严重差别。在波切洛山，当人们指着左边的位置告诉我“那些人是社会主义者”（意思是 PSUC 的人员）时，我感到困惑不解，说道：“难道我们不都是社会主义者吗？”我认为，大家都是拼死战斗的人，居然还存有党派之见这太愚蠢了，我的一贯态度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停止无聊的政治争论而同心协力并肩战斗？”这当然是反法西斯的正确态度，也正是英国报纸正在精心散布的言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不让人们弄清斗争的真实性质。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明确地保持这种态度。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每个人迟早都要站到某一边去。因为任何一个即使对政治党派和对立“阵线”全然漠不关心的人，他自己的命运显然也会被无情地牵入其中。作为士兵，他一方面是反对佛朗哥的战士，但另一方面也是两种政治理论激烈斗争中的棋子。当我在山上搜集柴草时，当我在巴塞罗那骚乱中躲避共产党人的机枪扫射时，当我最后在警察的追捕下逃离西班牙时，我总是在想，这是否就是真正的战争，还是《新闻报》捏造出来的那种战争，——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特别，因为我是在为 POUM 的部队服务，不是站在 PSUC 的一边。这两套大写字母看起来平常，其实却有天壤之别！

要想理解政府一方的同盟，那就必须回顾战争是如何开始的。7 月 18 日战斗开始后，欧洲每一个反法西斯战士都充满了希望。显然，至少在这里民主与法西斯势不两立，因为多年以来所谓民主国家一直在一步一步地向法西斯投降。日本被允许在中国的东北为所欲为；希特勒已经攫取了权力，开始屠杀各种政治反对派。墨索里尼轰炸埃塞俄比亚之后，五十三个国家（我认为是五十三个国家）明确地发出了“不干涉”的声音。但出人意料的是，当佛朗哥试图推翻温和的左翼政府时，西班牙人民却站起来反对他。这好象是——或者可能就是——潮流的转向。

然而，有一些事情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首先，严格说来，不应将佛朗哥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相提并论。他所发动的叛乱，基本上属于贵族和教会支持的军事政变，至少在初期是如此，它并不是为了推行法西斯主义，而是为了复辟封建主义。这意味着佛朗哥反对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而且包括各种各样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而正是这些人支持以较为现代形式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并非像我们在英国那样仅仅以“民主”和“维持现状”的名义反对佛朗哥，他们的抵抗运动带有一——也可以说包含着——十分明显的革命性质。土地被农民夺取，工厂和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被工会夺占，教堂被拆毁，牧师被赶跑或杀害。而在天主教牧师的欢呼声中，《每日邮报》则把佛朗哥描绘成一个爱国者，使他的国家脱离可怕的“赤”祸。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佛朗哥真正的反对者不是政府，而是工会。早在叛乱爆发时，组织起来的城镇工人就号召进行总罢工，要求分发、并通过战斗夺取弹药库中的武器。如果他们不是完全自发和独立的行动，佛朗哥也许不会进行反击。当然，事情并非必然如此，可至少有理由这样认为。尽管很早就预料到叛乱的爆发，但西班牙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阻止，甚至根本没打算阻止叛乱。政府

³（校注）这是第一版的第 5 章，第二版以后按作者的意图，放到结尾之后作为附录 1。

表现软弱，态度游移不定，以至于西班牙在一天之内竟更换了三位总理⁴。而且，政府只是勉强地采取一些让工人获得武器以避免形势急转直下的行动，算是对群众的暴力骚乱作出了反应。然而，武器已经散发，在西班牙东部的一些大城镇，在一些仍然效忠政府的武装力量（袭击卫队等）的帮助下，主要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奋力战斗，打败了法西斯主义者。这是那些只有为革命——例如，相信为了改变现状而战——才能采取的行动。在各地的反叛中心，据说一天就有三千人战死于大街小巷。男男女女们仅凭手中的雷管和炸药在广场上左冲右突，捣毁了训练有素的士兵用机枪把守的堡垒。法西斯主义者在战略要害部署的机枪阵地被时速六十英里的出租车冲毁。即使从未听说过农民夺取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等等，很难相信作为抵抗运动中坚力量的安那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实正在保卫资本主义的民主事业。而在安那祺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只不过是中央集权化的虚伪工具。

与此同时，工人手中掌握着武器，他们这时拒绝交出武器。（据说即使在一年以后，加泰罗尼亚安那祺-工联主义者仍拥有三万支步枪。）在一些地方，支持法西斯的大地主的土地被农民夺取。工业和交通部门出现集体化运动，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们开始通过成立地方委员会建立了工人政府的雏形，用工人巡逻队取代了支持资本家的旧警察，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人武装，等等。当然，这一进程并没有在各地同步发展起来，加泰罗尼亚行动得最彻底。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机构几乎没有受到冲击，有的地区政府与革命委员会同时并存。在一些地区，安那祺主义者建立了独立的公社，有些存在了一年之久才被政府镇压下去。在加泰罗尼亚，安那祺-工联主义者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掌握了实权，控制了大多数关键性的工业部门。事实上，西班牙所发生的不仅是内战，而是革命的开始。西班牙以外的反法西斯新闻媒体将实质遮掩，把问题狭隘地解释为“法西斯与民主之间的斗争”，而把革命的一面则尽可能地掩藏起来。在英国，新闻更为集中化，公众更容易受到欺骗，人们只知道有两种西班牙战争的说法：右翼称之为基督教爱国者与嗜血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左翼称之为温和派共和人士对军事叛乱的镇压，而核心问题则被成功地掩藏起来。

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支持法西斯的新闻媒体散布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的谎言，而善意的宣传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是在帮助西班牙政府，防止西班牙“赤化”。但主要的原因是：除了各国的一些小规模革命团体外，整个世界都在下决心阻止西班牙革命。西班牙共产党尤其是这样，它仰仗苏联的支持，全力反对进行革命。这些共产党人的理论是，在这个阶段进行革命必将产生致命的后果，在西班牙要做的不是由工人来控制，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特别需要指出“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持有这种观点。外国资本在西班牙有着大量的投资。例如，巴塞罗那运输公司就有上千万的英国资本，而工会却控制了加泰罗尼亚的所有交通。如果革命继续推进的话，将不会给予外国资本以任何补偿，即使给予，也少得可怜；如果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上风，则将能够保证外国投资的安全。既然革命要被粉碎，事情就大为简化，好像什么革命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每个事件的实质意义就可以被掩藏起来，权力从工会向中央政府的每次转移都能以军事重组的必要步骤来进行。最后产生的结果非常奇特。在西班牙境外，几乎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革命，而在西班牙境内，则没有人怀疑那里发生了革命。即使处在共产党人控制之下的、或多或少地执行反对革命的政策 **PSUC** 的报纸，也都在谈论“我们的光荣革命”。与此同时，外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媒体则在高喊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革命的迹象，并没有发生夺取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之类的事件；或者，换言之，即使发生了，也“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意义”。用《每日工人报》（1936年8月6日）的话来说，只有那些彻头彻尾颠倒黑白的人才说西班牙人正在进行社会革命，或者说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外的任何革命。相反，胡安·洛佩兹，一位巴伦西亚政府的成员，在1937年2月宣称，“西班牙人正在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了民主共和国和宪法文本，而是为了……革命。”如此看来，那些所谓彻头彻尾颠倒黑白的人也包括政府官员，而我们正是为政府而战的。一些外国反法西斯报纸甚至附和这类可怜巴巴的谎言，佯称教堂只是在被法西斯占为堡垒时才会受到攻击。事实上，各类的教堂

⁴基罗加、巴里奥斯和希拉尔，前两位拒绝把武器分发给工会。

遭受破坏乃是势在必然，因为人们知道西班牙教堂是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西班牙的六个月中，我只见到过两座未受破坏的教堂，除了马德里的一两座新教教堂外，其他教堂直到 1937 年 7 月才被允许重新开放和举行仪式。

但是，这比只是革命的开始而非终结。工人，自然是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的工人，即使有能力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去推翻或完全取代政府。他们显然不能这样做，因为佛朗哥尚在门前叫战，相当一部分中间阶层还依附在他们那边。国家处于转型状态，要么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要么回到往常的资本主义共和。农民占据了绝大部分土地，他们想保住这些土地，除非佛朗哥获胜而被夺走。所有的大工业都已经被集体化了，但继续保留集体化、还是重新引入资本主义，最终要看哪一方获胜。起初，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都可以明确声称代表工人阶级。中央政府由左翼社会主义者卡巴列罗领导，包括代表劳工总会 UGT（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和 CNT（安那祺主义者控制的工团主义联盟）的部长。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实际上一度被主要由工会代表组成的反法西斯防务委员会⁵取代。后来，防务委员会解散，自治政府重组，以便代表工会和各种左翼政党。但随后政府的每次改组都是向右翼方向发展。首先是 POUM 被清除出自治政府，六个月后卡巴列罗被右翼社会主义者罗格林取代，不久 CNT 被挤出中央政府，然后是 UGT，接着是 CNT 被自治政府推出门外，最后，战争和革命爆发一年以后，政府完全由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组成。

全面右转开始于 1936 年 10 到 11 月，这时苏联开始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权力从安那祺主义者手中转到共产党人手中。除了苏联和墨西哥，其他国家都没有诚意来挽救共和国政府。墨西哥显然不能大量提供武器，苏联相应地处于支配地位。人们对下述说法没有丝毫怀疑：“防止革命，否则你就得不到武器。”反对革命的第一步是将 POUM 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中驱逐出去，这是在苏联的命令下采取的行动。尽管有人否认苏联政府直接施加了压力，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可以说当时各国共产党都必须听苏联的。无可否认的是，西班牙共产党是主要的推动者，先是反对 POUM，后来反对安那祺主义者和卡巴列罗派的社会主义者，直至全面推行反对革命的政策。一旦苏联进行干预，共产党人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其一，他们对苏联提供武器感激不尽，而且共产党事实上看起来能够赢得战争胜利，特别是在国际纵队到达之后更是如此，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声望。其二，苏联提供的武器源源而至，共产党及其盟党却甚少将其交给他们的政治对手。⁶其三，共产党人所宣称的非革命政策，能够吸引所有那些深受极端主义者恐吓的人。例如，可以轻易地团结富裕农民反对安那祺主义者的集体化政策。其党员人数迅速增长，主要是店主、官员、军官、富裕农民等中产阶级。战争基本上是一场三角斗争。与佛朗哥的战斗仍在继续，但政府的另一个目标却是夺回工会手中掌握的权力。这主要是通过采取一系列细微的，但从总体上来看却又很精明的行动来完成的，也就是像某些人所说的令人听起来刺耳的政策。直到 1937 年 5 月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全面的反革命活动，几乎不需要使用武力。在一种无须过多解释的观点影响之下，工人总是被迫就范：“如果你不这样做或那样做，我们将输掉战争。”不用说，在每一种场合，军事紧急性都要求工人放弃他们在 1936 年取得的成果。当然这一观点不言自明，因为革命派政党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战争的失败：如果战争失败，那么所谓民主和革命、社会主义和安那祺主义都将变成毫无意义的词语。安那祺主义者是唯一举足轻重的革命派别，却被迫一步一步地后退。集体化进程受到压制，地方委员会被废除，工人巡逻队被禁止活动，战前的警察队伍被恢复并被迅速扩充、添加装备，工会控制的各种主要工业部门被政府接管（占领巴塞罗那电话局，并由此引发五月战斗，就是其间发生的事件）。最后，最重要的是，工会组织的民兵渐渐被解散，并被改编到新建的大众军这个半资产阶级阵线的“非政治化”

⁵ 代表按比例从各组织成员中选出，九名代表工会，三名代表加泰罗尼亚自由党，两名代表各种马克思主义政党（POUM、西班牙共产党，等等）。

⁶ 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拉贡前线几乎没有苏联武器的原因，那里的部队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直到 1937 年 4 月，我所见到的唯一的苏联武器，除了飞机（可能是苏联生产的，也可能不是）就是一挺机关枪。

的军队。这支军队有不同的工资级别、不同的特权军阶等。在特定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不过这在加泰罗尼亚要比其他地方发生得晚，因为那里的革命团体最为强大。显然，工人想要确保他们的胜利，唯一的办法是保持部分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通常，解散民兵是以提高军事效率的名义来进行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需要进行彻底的军事重组。其实，民兵组织完全可以在工会的直接控制之下进行改编，并提高他们的效率。但实行重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安那祺主义者继续拥有自己的军队。况且，民兵组织中的民主精神极易使之成为革命思想的温床。共产党人非常清楚这一点，猛烈抨击和坚决反对POUM和安那祺主义者坚持的所有人同等待遇的原则。当时出现的全面“资产阶级化”的运动，就是为了故意破坏革命初期的平等主义精神。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在几个月后到达西班牙的人，都说它几乎不像是同一个国家。它已从一个至少在外表上显而易见的工人国家，变成了一个有贫富差别的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1937年秋，“社会主义者”罗格林公开宣称“我们尊重私有财产”。战争初期被认为是同情法西斯而逃到国外的议员们现在又重新回到了西班牙。

如果联想到法西斯以某种形式对资产阶级和工人施加影响从而使他们暂时联合的话，整个过程就很容易理解了。这种联合被称作“大众阵线”，基本上是敌对派别之间的联合，它似乎总是以一方吃掉另一方而告结束。在政府的各个派别之中，共产党人不代表极左派，而是代表极右派，这是西班牙局势唯一出人意料的地方，这在西班牙之外的国家产生了很多误解。实际上，这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法国，正统的共产主义暂时必须被当做反对革命的力量。共产国际的所有政策均从属于某种相应的军事联盟体系保卫苏联（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形势，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苏联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法国的结盟。这种结盟其实对苏联于事无补，除非法国资本主义强大，所以法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反对革命的。因此，这不仅意味着法国共产党如今要在三色旗下唱着马赛曲前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必须终止在法国殖民地进行的所有卓有成效的宣传。法共总书记多烈士曾经宣布法国工人决不受骗去与德国的同志进行斗争⁷，然而没过三年时间，他就变成了法国最高调的爱国主义者之一。任何国家共产党人的行为，均与该国对苏军事关系（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潜在的）息息相关。例如，在英国这种关系还不明确，所以英国共产党仍然对国民政府持有敌意，公开反对重新武装。然而，如果英国与苏联结盟或者建立军事上的互信关系，英国共产党人就会像法国共产党人一样别无选择，只得成为虔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这种迹象早已存在。苏联的盟友法国将坚决反对邻国进行革命，将竭尽全力防止西班牙属国摩洛哥的解放，西班牙共产党人“阵线”毫无疑问会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接受了莫斯科红色革命的资助的《每日邮报》，坚持错误道路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恃无恐。实际上，西班牙共产党是最先起来防止革命的。当右翼完全控制政权之后，他们表现得比自由派更愿意对革命的领导人穷追猛打。⁸

……从政治理论的观点来看，PSUC、POUM、CNT—FAI三个政党可以大致被称作安那祺主义政党。我先是说PSUC，它是最重要的政党，也是最终取得胜利的政党，当时就看得到的好处是它处于上升势头。

需要解释的是，当人们说到PSUC“阵线”时，人们实际上说的是共产党“阵线”。PSUC（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组建于战争初期，融合了包括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在内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政党，但现在它完全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依附于第三国际。在西班牙其他地方并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正式联合，但共产党人和右翼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都被认为是一样的。大致说来，PSUC是社会主义工会UGT(劳工总会)的政治机构。工会的会员约有一百五十万，包括各种体力劳动者，但因战争爆发，大量的中间阶层也加入进来。在初期的“革命”日子里，各阶层的人都发现加入UGT或CNT颇有用处。这两

⁷ 1935年3月在议会下院的发言。

⁸ 弗朗兹·博克瑙的《西班牙战场》对政府与各党派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精彩的描述，请参阅。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西班牙战争的最好著作。

个工会集团互相重叠，但在两者之中，CNT 更明显地表现为工人阶级组织，PSUC 则是既代表工人阶级又代表店主、官员和富裕农民等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PSUC “阵线”曾在全世界的共产党和支持共产党的新闻媒体上展开宣传。其基本内容是：

“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赢得战争，除了胜利，战争中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因此现在不是谈论推进革命的时刻。我们不能通过集体化来脱离农民，我们不能吓跑正在与我们并肩战斗的中间阶层。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必须制止革命的混乱。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取代地方委员会，我们必须拥有训练有素、全副武装、指挥统一的军队。执迷于支离破碎的工人控制和对革命词句鹦鹉学舌将未受其益，反受其害，这将不仅阻碍革命，而且是反革命，因为它会产生分裂，让法西斯主义者用来对付我们。现阶段我们不是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议会民主而进行斗争。谁如果能把内战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谁就是让法西斯得益，实际上就是叛徒，哪怕不是有意为之。”

除了当然的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性外，POUM “阵线”与此完全不同。POUM 是最近几年来因为反对在表面上或实际上改变共产党政策的“斯大林主义”而在一些国家中出现的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POUM 中有退党的共产党员，也有早期的工农集团政党的党员。从党员数量来看，这是一个小党⁹，在加泰罗尼亚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其重要性主要在于党员的政治觉悟非常高。它在加泰罗尼亚的据点是莱里达。它并不代表任何工会集团。POUM 的民兵主要是 CNT 的成员，但真正的党员一般属于 UGT。然而，POUM 只有在 CNT 中才有一些影响。POUM “阵线”的基本主张是：

“谈论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法西斯只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亦然。以‘民主’的名义反对法西斯就是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反对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后一种形式在任何时候都容易转化成前一种形式。唯一真正能替代法西斯主义的是由工人阶级进行统治。如果你不以此为目标，要么是把胜利拱手送给佛朗哥，要么最多是从后门领进来法西斯。与此同时，工人必须牢牢掌握自己获得的每一个胜利。如果他们把任何东西交给半资产阶级政府，那么他们就上当受骗了。工人民兵和警察必须以现有形式保存下来，他们必须抵制任何‘资产阶级化’的行动。如果工人阶级不控制武装力量，武装力量就会控制工人阶级。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

安那祺主义者的观点无法轻易加以界定。在任何情况下，泛泛而谈的“安那祺主义”一词经常被用来涵括许多不同的观点。CNT 是通过各种联合形式组成的一个大集团，约有两百万成员，有自己的政治机构 FAI：一个安那祺主义组织。但即使 FAI 的成员，虽然总是和大多数西班牙人一样带有些微的安那祺主义哲学色彩，也并非必然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安那祺主义者。特别是从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更多的是朝着普通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因为环境迫使他们参与集权化的行政，甚至背离了他们的一些原则参加政府。不过，他们与共产党人有着天壤之别。就像 POUM 一样，他们的目标是工人阶级控制，而不是议会民主。他们接受 POUM 的“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的口号，虽然他们对此并不那么教条。大致说来，CNT-FAI 主张：（1）让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来直接控制工业，如交通、纺织等；（2）由地方委员会来掌管政府，抵制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主义；（3）对资产阶级和教会采取不妥协的敌对态度。最后一点虽然最不准确，却最为重要。安那祺主义者反对大多数所谓的革命，虽然他们的原则很模糊，但他们真真切切地痛恨特权和不公正。从哲学上来看，共产主义和安那祺主义截然相反。实际上，在追求的社会形式方面，差别主要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完全无法调和。共产党人总是强调中央集权和效率，安那祺主义者则强调自由和平等。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在苏联的影响减弱时，可能超过了共产主义。在战争的

⁹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人数数据如下：1936 年 7 月 1 万人；1936 年 12 月 7 万人；1937 年 6 月 4 万人。但这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数据，对手的估计是这些数字需要除以 4。人们唯一可以肯定地说，每个西班牙政党都高估了自己党员的人数。

最初两个月，正是安那祺主义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力挽狂澜。尽管既无组织也无纪律，安那祺主义的民兵却仍以西班牙部队的最佳战士而著称。大约从 1937 年 2 月以来，安那祺主义者和 POUM 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如果安那祺主义者、POUM 和左翼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就有意联合起来，并执行较为现实的政策，战争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但在战争初期革命派似乎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安那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向来就互相嫉妒；作为马克思主义者，POUM 对安那祺主义持怀疑态度；而从纯粹的安那祺主义立场来看，POUM 的“托洛茨基主义”与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不过是半斤八两。不过，共产党人的策略是推动两个党走到一起。POUM 在五月巴塞罗那代价惨重的战争中，主要是出于本能站到了 CNT 一边。后来，POUM 被镇压，唯有安那祺主义者敢于替他们说话。

因此，大致说来，各种政治党派力量的联盟就是这样的状况。一方面，CNT-FAI、POUM 和一部分社会主义者要求工人控制，另一方面，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则要求中央政府以及正规化的军队。

.....在新闻记者看来，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一样喧嚣纷争。仅存的差别，是记者并不会对敌人进行最恶毒的咒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是共产党人和 POUM 之间开始相互发动更厉害的文攻，而且远远超过对付法西斯主义者的激烈程度。不过，那时我并未让自己太过当真。这种党派间的长期争斗确实让人厌烦，但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内部的激烈争吵而已。我不相信这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相信双方的政策差异真的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我认为，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尽管反对革命向前发展，却无力把革命拉回来。

对于这一点，我有充分的理由。在这期间我一直待在前线，前线的社会政治气氛没有发生变化。在我一月初离开巴塞罗那到前线、直到四月底离开前线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也许持续到更晚一些时候——阿拉贡一带都是由安那祺主义者和 POUM 的民兵部队控制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下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革命氛围一如我最初了解的那样。将军和士兵、农民和民兵仍然平等相待，每个人都拿同样的薪金，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称别人为“你”和“同志”，没有老板，没有仆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律师，没有神职人员，没有卑躬屈膝，没有脱帽致敬。我呼吸着平等的空气，我幼稚地以为西班牙各地都是如此。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只是碰巧置身于西班牙工人阶级最革命的队伍里。

.....“战争第一，革命其次”是一个再三出现的口号，普通的 PSUC 民兵虔诚地相信这一口号。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打赢战争之后革命会继续下去。这个口号只是一句空话。共产党人努力争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适宜的时候，而是确保它永不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权力越来越远离工人阶级的控制，随着越来越多各阶层革命人士被投进监狱，事情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每一项变动都是以军事需要为名来进行的，因为这个借口是现成的，而结果总是把工人从有利位置上赶走，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抵制重新引入的资本主义制度。.....

我已经描述了我们在阿拉贡前线是如何被武装又不被武装的情形。几乎不用怀疑，武器被蓄意收回，以免过多的武器流入安那祺主义者手中，因为他们日后会把这些武器用于革命目的。结果呢，从阿拉贡发起的强大攻势，本来可以迫使佛朗哥从毕尔巴鄂甚至从马德里后退，却根本没有发生。相对而言，这些也许只是一桩桩小事。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争被狭义地理解为“争取民主的战争”，那就难以吸引国外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支援。如果直面这一个事实，我们就必须承认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认识不一。尽管已有数万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战斗，但在他们的身后更有千百万人无动于衷。.....

为什么摩洛哥没有发生起义？佛朗哥正在企图建立声名狼藉的独裁制度，而摩洛哥人宁可接受佛朗哥的统治，也不愿接受大众阵线政府！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人在摩洛哥发动起义，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把革命置于战争之上。当然，为了让摩洛哥人相信政府这边的诚意，最重要的还是让他们真正获

得解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法国人对此会感到多么快意！这场战争中最重要战略机遇，在于打破人们对于英法资本主义的空想。整个共产党人的政策倾向是尽量让这场战争成为一种普通的、非革命的战争，而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接连遭受重挫。……

[附录 2]¹⁰

…对于巴塞罗那战斗，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非常准确、毫无偏见的描述。因为缺少保留下来的必要记录。除了一大堆指控和政党的宣传材料外，后来的历史学家不会获得任何别的东西。而我，除了自己的亲眼所见，以及从我认为可靠的见证者那里听到的以外，也同样几乎没有什么资料。然而，我能驳斥一些极为可耻的谎言，帮助人们从某种视角来理解这一事件。

首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整个加泰罗尼亚的局势都很紧张。在这本书的前几章里，我已经描述了共产党和安那祺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事态发展到 1937 年 5 月，暴力似乎已经无法避免。造成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命令上缴所有的武器，并决定以此建立一支不允许工会会员加入的“非政治的”武装警察部队。这样做的意图很清楚。同时很明显，下一步行动就是接管由 CNT 控制的关键性的工业部门。此外，由于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以及感到革命已经受挫的普遍模糊感觉，在工人阶级中间产生了相当的怨恨情绪。这样，由于 5 月 1 日没有发生骚乱，许多人感到又惊又喜。5 月 3 日，政府决定接管电话局。这里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主要由 CNT 的工人管理。据称，电话局管理得很糟糕，官方的电话被窃听。警察局长萨斯拉斯（不清楚他是否越权执行了命令）派了三卡车的武装突击队，占领了电话大楼，而携带武器的便衣警察则封锁了大楼附近的街道。大约在同一时间，突击队还占领和控制了市内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各种建筑物。无论这些行动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人们普遍相信，这是突击队和 PSUC（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向 CNT 发起总攻的信号。到处传言说工人们的建筑物遭到了袭击，武装的安那祺主义者出现在大街上，人们不再工作，战斗很快就会打响。当晚以及第二天早上，全城到处建起了街垒，但直到 5 月 6 日早晨才发生战斗。然而，双方进行的主要是防御性的战斗。建筑物虽然遭到包围，但据我所知，并没有受到进攻，双方也都没有使用大炮。大体说来，CNT-FAI 和 POUM 控制了工人阶级聚居的市区，武装警察和 PSUC 则占据了城市中心地带和各政府机关。5 月 6 日，双方曾有短暂的休战，但可能由于突击队急切地想要解除 CNT 工人的武装，冲突很快重新爆发了。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开始主动撤离街垒。5 月 5 日晚间前后，CNT 曾取得胜利，大批突击队的士兵投降。但 CNT 没有公认的领袖，也没有固定的计划。事实上，人们也能看得出来除了抵抗突击队的模糊决心，根本就没有任何计划。CNT 的政府领导人与 UGT 的领导人一起，恳求每个人都回到工作岗位上，毕竟，这是食物日益短缺的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战斗，谁也不知道究竟将会发生什么。5 月 7 日下午，局势基本恢复正常。那天傍晚，6 千名来自巴伦西亚的突击队由海路抵达巴塞罗那，控制了整个城市。政府发布命令，要求除了正规军所持有的武器外，其他所有人的武器都必须上缴。在随后的几天里，政府收缴了大量的武器。官方公布了战斗中的伤亡人数，死亡 4 百人，约 1 千人受伤。死亡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由于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只能将其视为准确的统计数字。

其次，这场战斗的后果是什么？…这场战斗为巴伦西亚当局直接控制加泰罗尼亚提供了借口，为瓦解民兵提供了借口，为镇压 POUM 提供了借口，并且无疑也为卡巴列罗政府的垮台出了一份力。…真正重要的是，走上街头的 CNT 的工人通过这场战斗，是否得到了或失去了些什么。我认为，当然纯粹是猜测，他们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占领巴塞罗那电话大楼只是相当长的计划中的一个事件。自去年起，

¹⁰（校注）第一版作为第 11 章。

企业联合会已经逐渐失去了直接的权力，总体运动也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控制而渐为集权领导层所左右，引向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可能重新引入私人资本主义。人们的抗拒可能使这进程放缓。战争爆发一年后，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失去了大部分的权力，但他们的处境仍相对有利。面对无论什么样的挑衅，如果他们明确地流露出他们不会斗争，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有时候，即使被打败了，拿起武器但总比放弃斗争要好得多。

第三，隐藏在这场战斗背后的目的，如果有的话，究竟是什么？是军事政变还是企图进行革命？是确实意在推翻政府吗？是有预谋的吗？

...在安那祺主义者一方，他们的行动几乎是自发性的，因为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主要是普通民众。当人们走上街头以后，他们的政治领袖才极不情愿地跟了上去，或者根本就没有卷入其中。在紧张的革命气氛中，唯一仍敢发出声音的是杜鲁提之友（FAI 内的小极端派）和 POUM。但和以往一样，他们只是跟随者而不是领导者。杜鲁提之友也许确实散发了某种革命性的传单，但传单直到 5 月 5 日才出现在街头，谈不上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因为战斗早在两天前就已自发开始了。CNT 的政府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否认整个事件。这有许多方面的理由。首先，CNT 仍在中央政府和自治政府中有自己的官员，使它的领导人比一般党员更保守。其次，CNT 领导人的主要目标，是与 UGT 结成联盟，而冲突只会加剧 CNT 和 UGT 之间的裂痕，至少当时是这样的。第三，虽然这一点当时不为人所知，安那祺主义的领导人担心事态的发展如果越过了某个界限，工人占领整个巴塞罗那，正如他们可能在 5 月 5 日所做的那样，那就有可能引发外国的干涉。英国的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已经逼近巴塞罗那港口，毫无疑问，不远处一定还有更多的战舰。英国的报纸宣称，这些舰船正在驶向巴塞罗那，“以保护英国的利益”。但实际上，它们还没有这样做，也就是说，没有派遣军队登陆，也没有接受难民。我们并不能确知这一点，但至少在本质上，英国政府虽然在西班牙落入弗朗哥手中时没有动一下手指头，但却有可能迅速干预这场战斗，使政权不至于落入工人阶级的手中。.....

CNT 的领导人并没有从更谨慎的态度中得到太多好处，他们的忠诚受到称赞，但转机一旦出现，中央政府和自治政府就将他们踢出门外了。

...安那祺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即便他们放下武器，加泰罗尼亚的主要政治力量 PSUC 仍会把武器留在手中。战斗结束后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其间，在街上看得到大量的武器。虽然这些武器在前线很受欢迎，但最终却留在了后方“非政治的”警察手中。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共产党和安那祺主义者之间仍有不可调和的分歧，迟早都必然会导致某种斗争。自战争开始以来，西班牙共产党的人数激增，他们夺取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国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来到西班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公开表示，一旦反对弗朗哥的斗争取得胜利，就会“清算”安那祺主义。在这样的境况下，人们很难期待安那祺主义者会愿意交出他们在 1936 年夏天得到的武器。

占领电话局仅仅是点燃既有炸弹的导火索。也许恰好可以预料的是，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认为不会有麻烦。据说，几天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总统孔帕尼斯笑着宣布，安那祺主义者会忍气吞声、承受一切的。¹¹但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决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在过去的好几个月里，共产党和安那祺主义者在西班牙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在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其首府巴塞罗那，局势日趋紧张，已经发展成街头争吵、谋杀，等等。突然间，全城的报纸都在报道手持武器的人正在进攻工人在七月战斗中夺取的并在感情上极为重视的建筑物。我们必须记住，工人阶级并不喜欢地方卫队。对过去的数代人来说，卫兵是领主和老爷的保镖，而地方卫队遭受到加倍的仇恨，因为人们纷纷猜测，而且有充分的

¹¹ 《新政治家》1937 年 5 月 14 日。

根据，他们对法西斯的反对十分可疑。¹²促使人们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走上街头的情感，可能就是促使他们在战争之初抵抗叛乱将军的同样情感。...（政府占领电话局）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必定会导致一场冲突。这是一种挑衅性行为，是一种威胁性的姿态，基本含义是说：“你们的权力终止了，由我们来接管。”以为人们不会反抗，违背了基本常识。

.....（国防部长普列托）补充说，“逮捕POUM的领导人不是政府的决定，而是警察擅自行事的。那些肇事者不是警察局的领导，而是他们的下属。共产党已经按照通常的一贯做法，渗入了其中。”他引述了另外几件警察非法抓人的案子。同样，（司法部长）伊鲁霍也宣称，警察已经成为“准独立的”机构，处于外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普列托向代表团相当露骨地暗示，当俄国人向西班牙提供武器时，政府无法承受冒犯共产党的代价。当一个由约翰·麦戈文议员率领的代表团12月来到西班牙后，他们得到了与此前基本相同的回答。内阁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甚至用更清楚的词汇重复了普列托的暗示：“我们得到俄国人的援助，就必须同意采取某些我们不喜欢的行动。”可以说明警察独立行事的有趣事实是：麦戈文等人即使有监狱长、司法部长签署的命令，也不会获许进入任何一个共产党在巴塞罗那控制的“秘密监狱”。

13

（摘录完）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1年7月20日校改]

¹² 战争一爆发，地方卫队就与更有势力的党派站在了一边。在后来的战争中，在好几个地方，例如在桑坦德，当地的卫队全都转向了法西斯势力。

¹³ 关于两个代表团的报告，参见9月7日的《民众报》以及9月18日的《箭报》、《独立新闻报》（巴黎）刊登的马科斯顿代表团的报告，和麦戈文的小册子《西班牙的恐怖》。